

柳鸣九 等著 薛让庭 编

雨果创作评论集

译
者

漓江出版社

雨果创作评论集

柳鸣九 等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8.625印张 插页2 199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200册

书号：10256·46 定价：0.93元

前　　言

一九八一年五月中旬，在湖南长沙召开了普希金、雨果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二百多位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翻译、出版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以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为中心，召开这样规模的学术性讨论会，不仅说明打倒“四人帮”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对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视，同时也是我们的工作有了发展，正在深入的标志。会议期间，提交大会的评论雨果的论文近九十篇。这个集子所收的文章，就是从这些论文中挑选出来的。

维克多·雨果（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是我国最早翻译介绍的外国作家之一。这个工作，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开始，迄今已近八十年了。

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是他的作品中最早被介绍到我国来的，译本也最多。最早的本子由苏曼殊在1903年译出，以《惨世界》为名，由泰东书局印行。^①此后，又有两个译本：一是1906年小说林书局出版的平云的译本，书名《孤儿记》；一是

^① 另据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称，该书是苏子谷（即苏曼殊）和陈由己（即陈独秀）合译，东大陆书局出版。

1907年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中的文言印本，书名《孤星泪》。另外，还有《悲惨世界》的节译本《少年哀史》，由柯蓬洲译，世界书局出版。1944年，重庆正风出版社重印过苏曼殊的译本，但译文不全，并有改动。

1905年，包天笑翻译了雨果的早期小说《布格·雅加尔》，用《侠奴血》为书名，由小说林书局出版。

1910年，包天笑、徐作呆合译《牺牲》。此后，这个剧本又有两个译本，一是东亚病夫曾孟朴译的《项乐日》（《银瓶怨》），真善美书局1930年版；一是平等阁译的《牺牲》。

1916年，东亚病夫译出戏剧《枭歟》，这就是1927年译者改译过的《吕柏兰斯鲍夏》，真善美书局出版。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雨果著名的浪漫主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书名《活冤孽》，译者俞忽。1928年，真善美书局又出版了东亚病夫翻译的《钟楼怪人》。

1925年，东亚病夫译成著名悲剧《欧那尼》，由真善美书局出版。1945年，陈瘦竹根据英译本重译了这部作品，1947年由群益出版社作为“群众翻译剧丛之三”刊行。

1928年，真善美书局出版了平情主人翻译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书名为《噫有情》。

此外，雨果著名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先有林琴南的译本，名为《双雄义死录》，后有东亚病夫的译本，取名《九十三年》；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也有包天笑的译本，译名《铁窗红泪记》；还有东亚病夫翻译的《吕伯兰》。

除了翻译雨果的作品外，关于雨果及其创作的评介，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的也不少，其中有的是我国的研究者写的，有的则是翻译外国的评论文章。

解放后，关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翻译和评论，虽然在“文革”

时期停顿了十年有余，但总的来讲，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我国名作家茅盾建议隆重纪念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1952年，雨果作为世界文化巨人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过纪念他的活动，我国许多报刊发表了纪念和评论文章，其数量之多是空前的。雨果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局面：《银烛台》（《悲惨世界》节译）、《宝剑》、《雨果诗选》、《悲惨世界》、《九三年》、《笑面人》、《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都先后出版，其中《悲惨世界》、《九三年》、《笑面人》已经再版。在出版雨果作品的同时，一些国外名家如巴尔扎克、拉法格、罗曼·罗兰、阿拉贡、爱伦堡等论雨果的材料，一些国外研究成果以及一些有关雨果的重要资料，也都陆续介绍过来。打倒“四人帮”之后，对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更是空前活跃，短短的几年，发表了不少论文，为今后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关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不少问题正处于探索和争鸣之中。这个集子中的有些文章，就涉及到了这些问题。

第一，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雨果的评价。雨果是马、恩著作和信札中提到次数最多的浪漫主义作家，而不管直接还是间接谈及，几乎都是否定的。马克思在涉及雨果抨击拿破仑第三的《小拿破仑》时指出，由于作品没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因而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即“他没有看到，当他把世界历史上空前巨大的个人主动作用硬加在这个人身上，他就把这个人物描写成伟大的人物而非渺小的家伙了。”^①马、恩批评了雨果对待路易·菲力普王朝、政变前的拿破仑第三、巴黎公社及其某些措施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第1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的错误态度，还讽刺性地述说了雨果的沙文主义思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及雨果的十处文字，都是正确地从政治观上指出了作为政治家的雨果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象对待巴尔扎克那样，从文艺角度对作为作家的雨果进行全面评价。雨果的政治思想，的确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这过程虽然复杂，但来龙去脉却是清楚的，即从保皇主义，到拥护君主立宪，最后成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他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不仅以感人的艺术形象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在描写人民群众所从事的革命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革命暴力。这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中，是为数不多的。对于这样一位有广泛影响的重要作家，如果仅仅因为马、恩对其某一阶段政治上的缺点错误进行过批评，就放弃对他作品的社会思想内容进行具体研究，就不敢对他的艺术经验进行科学总结，这种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是不正确的。

第二，研究雨果及其创作，自然免不了要涉及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特别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关于浪漫主义，高尔基在他的《我怎样学习写作》一书中说过：“浪漫主义的定义，虽然一向有好几个，但是一切文学史家都承认的完全的定义，现在还不曾有，还没有完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过去不少文艺理论家在给浪漫主义下定义时，不是把浪漫主义作为独特的创作方法，概括出它构造艺术典型的特征，而是分别着眼于作品的社会思想内容、艺术风格、题材、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特点。这样，当然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能有个统一的看法。我们认为，通过对于雨果作品的深入研究，是会有助于对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取得共同认识的。

第三，由于对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缺乏共同的认识，所以对雨

果一类作家的归属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雨果早期无疑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但随着他社会阅历的加深、思想认识的提高，他的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雨果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的标志。甚至有人认为，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起，雨果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这种论断的产生，大约是因为有些同志有一种看法，即从反映生活的功能来看，浪漫主义较之现实主义是逊色的。所以，一看到比较深广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作品，就要把它拉入现实主义作品的行列，似乎浪漫主义文学很难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其实，这是误解，而且并不公允。诚然，巨型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有其现实主义的成分，如关于珂赛特悲苦的童年生活和芳汀的不幸身世的描绘，就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如果从《悲惨世界》的整体、从主要人物的塑造来看，显然和现实主义创作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对于雨果的创作，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框框出发，从主体出发而不是从部件出发，那么，雨果应该属于哪一文学流派，他的作品应该划入哪一类别，界线还是比较清楚的。

第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欧洲历史上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直到今天，它还是欧美许多作家用来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武器。雨果，可以说是拥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最突出的一个作家。这种思想贯穿他创作的始终，而且愈到后来，愈加强烈。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是“通过想象和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三棱镜”来反映世界的。那么，如何评价雨果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特别是他晚期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呢？当前，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这种分歧的由来在于对人道主义的不同看法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可以说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成反比例。特别是当无产阶级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之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它的确有调和阶级矛盾，削弱无产阶级斗志的消极作用。但是，能不能说，到了十九世纪，这种思潮就转变成为完全没落和极端反动的了呢？倘若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对包括雨果在内的一大批欧美作家就无法作出中肯的应有的评价了。因为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都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较深刻揭发和猛烈抨击的，他们也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倍受迫害和摧残的劳苦大众寄以深厚的同情，有的甚至对人民的反抗斗争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与支持的。这种种难能可贵的表现，如果都由于人道主义是没落、反动的而不得不彻底加以否定的话，恐怕对古人责之过苛，难以服人吧。因此，对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对雨果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研究，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也是研究雨果及其创作的重要内容。

第五，雨果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美的、丑的，有正面的、反面的，有外丑内美、内丑外美或内外全美的，各式各样，丰富多采。对这些人物，当前有的看法一致，有的不尽相同，甚至观点对立。后者如对于克洛德、沙威、朗德纳克等的不同看法就是。对于克洛德的形象，有的同志认为把他也写成宗教和禁欲主义的牺牲品，这就削弱了人物的揭露力量，有的则认为不如此塑造就会损害他的典型性。对于沙威最后投河自杀和朗德纳克在烈火中救出三个孩子的行为，有的同志认为这只不过是作者为了突现人道主义的无尽威力而背离人物性格的逻辑，外加上去的，有的则觉得他们的行为有其内在的根据。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无疑可以深化对于作家世界观和人物形象的认识。

第六，雨果在浪漫主义作家中艺术造诣很深，有着多方面的经验和成就。关于作品情节的组织、结构的安排、场面的配置、

环境的描写、理想的渲染、对照技巧的运用等等，雨果都显露了鲜明的特色。深入研究和总结这些方面的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而且也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借鉴。

以上涉及的，只是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中几个方面的情况。其中有的问题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有的问题则有不同看法。回避问题，永远不会走向真理；争辩，可以使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我们选编本书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于在同一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只要言之成理，都尽量予以选用。

解放三十多年来，对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翻译、评介、研究，如前所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雨果全集的出版，尚待筹划；雨果评传，尚待撰写；雨果创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还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编辑这本评论集的目的在于记下研究工作前进的脚印，并且希望能对今后的研究工作起一点促进的作用。由于编者水平和手边资料的限制，加上集子中有的同志的文章也是匆匆写成，因此，粗疏不当之处恐所难免，希望专家、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

曹让庭

1981年9月25日

于湘潭大学

目 录

雨果和他的创作	柳鸣九 (1)
雨果的文艺观	曹让庭 (44)
给浪漫主义应有的历史地位	周骏章 (60)
略论雨果的文学自由主义	翁长浩 (68)
《欧那尼》的历史意义	徐知免 (78)
思想的喇叭 艺术的高塔	
——试论雨果的《惩罚集》.....	甘运杰 (85)
雨果诗歌的音韵和语言艺术	冯汉津 (95)
善必然战胜恶	
——试论雨果小说中的人道主义	李广博 (108)
《悲惨世界》中的人道主义	茅于美 (120)
从《巴黎圣母院》看雨果的	
浪漫主义文艺观	金 易 (133)
一曲幻歌辨美丑	
——《巴黎圣母院》的浪漫主义手法	卞昭慈 (146)
《巴黎圣母院》的对照艺术	丁子春 (155)

论《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的圆心结构和 描写的多层次对照	张世君 (167)
笑面下的爱与恨	焦凤珍 (181)
人的颂歌	
——《海上劳工》读后	林一民 (192)
雨果对革命的思索	
——关于《九三年》的人道主义	林学锦 王毅 (199)
西穆尔登与罗伯斯庇尔	
——《九三年》人物形象管见	陈慧君 (211)
论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	张耀之 (219)
愤怒的控诉 深切的同情	
——评雨果的短篇小说《克洛德·格》	江伙生 (231)
主体结构、组成部件及其他	
——读《布格—雅加尔》札记	王忠祥 (236)
雨果生平创作年表	(250)
雨果研究资料索引	(255)

雨果和他的创作

柳 鸣 九

1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十九世纪。随着法国历史的进程，他在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政论等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在他的文学活动中打下了自己的印记，从而使他的整个作品构成了十九世纪法国政治、社会的变化和动态的一个侧影。

雨果于1802年2月26日生于贝尚松。他的父亲勃鲁都斯·雨果，平民出身，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军，在拿破仑时期曾转战南欧，得过将军头衔。雨果幼年跟随父亲到过意大利、西班牙，在西班牙开始受小学教育。雨果的母亲是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对少年雨果影响颇深。波旁王朝复辟后，雨果的父亲又宣誓效忠新统治者，雨果跟随母亲回到了巴黎。在中学时代，雨果就爱好文学并开始写诗。他在当时波旁王朝的桂冠诗人、消极浪漫

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盛极一时的名声影响之下，立下了这样的志愿：“成为夏多布里昂，否则别无他志”。由于雨果家庭在复辟王朝统治下的政治利害关系，也由于他母亲的影响，雨果初期的创作有保守甚至反动的倾向，如《读书乐》一诗因辱骂拿破仑是“蹂躏世界的暴君”而获得了官方的奖金。1819年，他与维尼等共同创办《文学保守者》周刊，公开站在伪古典主义一边。他初期的诗作都在这刊物上发表，后于1822年收集成第一个诗集。这些诗很多都是反对革命、拥护波旁王朝、歌颂保王主义和天主教的。由此，雨果相继两次获得路易十八赐给的年俸。1825年，他被授予荣誉勋章并参加了查理第十的加冕典礼。1826年，他把第一个诗集加以补充，成为《短曲与民谣集》出版。在这一时期，雨果还开始写作戏剧和小说。1822年，他与别人合作写作了模仿英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的剧本《阿尔·罗布沙尔》。1823、1826年，先后发表中篇小说《冰岛的汉》与《布格—雅加尔》，前者是一篇情节恐怖、充满了荒诞想象的低劣之作，后者以1791年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黑奴暴动为题材，但思想、艺术都不成熟，对贵族人物加以美化、对起义者有所歪曲，流露了青年雨果保守主义信仰的偏见。

查理第十上台后变本加厉的反动使革命逐渐酝酿成熟，在自由主义思想日趋高涨的背景上，雨果的政治态度开始有了转变。1826年，缺乏明确纲领、成立于1823年的浪漫派第一文社解散，雨果与维尼、缪塞、大仲马、诺缔埃另组第二文社，开始明确反对伪古典主义。1827年，他在《钢柱颂》一诗中缅怀了拿破仑时代对欧洲封建君主国家的武功。同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战斗性的浪漫主义宣言《〈克伦威尔〉序》，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从这一年起一直到1840年，他以丰富的戏剧、诗歌以及小说创作显示出浪漫主义文学的实绩。1828年，浪漫主义戏剧《玛丽蓉·德·

洛尔墨》由于批判了专制王权，遭到禁演。1829年，他同情和歌颂希腊解放斗争的诗集《东方集》问世，并出版了批判统治阶级以法律压迫劳动者的小说《死囚末日记》。1830年，他写作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和新颖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欧那尼》。这个剧本在七月革命前夕初次演出时，浪漫主义与伪古典主义的两派拥护者，在剧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演出最后得到极大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戏剧对古典主义戏剧的胜利，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雨果以欢迎的态度写作了热烈的颂诗《年轻的法兰西》。1831年他完成了浪漫主义文学中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上演了剧本《玛丽蓉·德·洛尔美》，发表了抒情诗集《秋叶集》。1832年以后，他相继发表的作品有剧本《国王取乐》、《吕克莱斯·波基亚》（1832）、《玛丽·都铎》（1833）、《安日洛》（1835）、《吕意·布拉斯》（1838）；诗集《黄昏歌集》（1835）、《心声集》（1837）、《光与影集》（1840）；小说《克洛德·格》（1834）以及杂文《文学与哲学札记》。七月革命以后这一时期雨果的戏剧与小说作品，充满着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精神，对过时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力量的激愤的控诉是这些作品的基调。

金融家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使雨果逐渐在政治上采取了和现实妥协的态度。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就职演说中，他虽然称颂了法国大革命，但表示拥护君主立宪制，不赞成共和政体。他1842年出版的游记《莱茵河》也再次表现了这种立场。1845年，路易·菲力普授予他“法兰西世卿”的称号。这一时期他在文学上的影响有所下降。1843年，他以德国中世纪历史为题材的剧本《城堡里的伯爵》上演，遭到失败。浪漫主义戏剧从《欧那尼》开始，经历了十几年的繁荣阶段，至此宣告终

结。1845年后，雨果在文学创作方面比较沉寂，在政治舞台上却很活跃。1848年以前，他一直在君主立宪制与共和政体之间摇摆，巴黎的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提出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后，他才坚决站在共和的立场上。这时他被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抱同情的态度。1848年底的总统选举中，他投票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久又成为这个野心家的反对派，他是1849年至1851年间国民议会中社会民主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帝制，大肆进行镇压，雨果和他的政派发表宣言试图反抗，但遭到失败，政变后的12月11日，他被迫流亡国外。

十九年流亡期间，雨果先后居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大西洋中英属杰西岛和盖尔勒赛岛，始终对拿破仑第三的独裁政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52年他出版了对拿破仑第三作了辛辣嘲骂的政论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成了揭露政变过程的《一个罪行的始末》（于1877年发表）。1853年，他“充满革命气势”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出版。1859年，他拒绝拿破仑第三的“大赦”。在流亡时期，他的其他文学创作有诗集《默想集》（1856）、《历代传说》（1859）、《街头与森林之歌》（1865），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以及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1864）。

1870年，拿破仑第三垮台，雨果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凯旋式地回到巴黎，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普法战争爆发后，他持反战的态度，但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围困巴黎时，他以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了斗争。他发表演说鼓舞人民的斗志，他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他捐款铸造抗战的大炮，其中的一尊就以“雨果”命名。1871年2月，他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时期，他在布鲁塞尔。他既同情公社又对公社不理解，但公社失

败后反革命刽子手大肆进行屠杀时，他挺身而出，保护被迫害的公社社员，宣布开放他在布鲁塞尔的住宅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并积极为被判罪的公社社员辩护，争取对他们的赦免。1872年，他刊行了在1870—1871年法国人民艰难时日中写的诗体日记《凶年集》。1877年以后，他完成了四部诗集：《作祖父的艺术》（1877），《历代传说》二、三集（1877、1883），《自由自在的精神》（1882）；两部政论：反对天主教的《教皇》（1878）和批判封建君主权力的《至高的怜悯》（1879），以及一部戏剧《笃尔克玛》（1882）。

1885年，雨果逝世于巴黎，法兰西举国致哀，巴黎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葬礼，参加的有巴黎公社的战士和穷苦的人民群众。他被安葬在伟人祠。

雨果的一生正当法国从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垄断资本主义。在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的政治态度与立场经常表现出矛盾与反复，这是他复杂的世界观和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动摇性所决定的。他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最初由信奉天主教到自然神论再到疑神论，最后又是泛神论者。他的政治信仰由保王主义发展到民主共和主义，其最高限度从没有超过1848年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水平。他指责资本主义的不正义，而其批判的尺度不过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是资本主义黑暗社会的愤怒揭露者，同时又迷信可以通过法律和教育改善人类的处境；他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尊严与自由，谴责沙皇、梅特涅、俾斯麦这些民族压迫者，对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烧劫圆明园表示愤慨；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热切希望“战争将有一天消灭，人类将更为美好”，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不理解民族奴役和殖民战争的社会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对资产阶级进行英勇斗争的

时候，雨果一方面站在资产阶级营垒中反对无产者的暴动起义，另一方面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又充满了同情，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表示了强烈的憎恶。雨果在政治上犯有不少错误，但总起来说，他随着时代不断进步，并且在法国社会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捍卫了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进步的思想传统，成为文学上和政治上的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卓越代表。

2

十九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运动，是在和伪古典主义激烈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新的文学运动要为自己开拓道路，就必须批判过时的古典主义，也必须为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创作理论而“大喊大叫”。雨果担负了这个任务，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发言人。他的理论阐明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的一般特征，是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的典型标本。

1826年以前，雨果在文艺思想上经历了由保守派发展为调和派再发展为革新派的过程。他早期是古典主义的拥护者。1823年左右，他力图在当时已尖锐冲突的两种文学思潮中充当调停人，想找到一种“彼此谅解的办法”。然而，他这时期所写的理论文章也开始表现出他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态度。

从1826年开始，雨果旗帜鲜明地投入了浪漫主义与伪古典主义的文艺论争。他的《〈短曲与民谣集〉1826年序》就显示了这种新的姿态，而他在18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更成为了声讨伪古典主义的檄文，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浪漫主义流派的旗帜。这一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戈蒂叶后来这样回忆说：“那真是奇妙的年代。《〈克伦威尔〉序》在我们眼里发出灿